

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中的文化隐喻

摘要：《我的名字叫红》是19世纪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代表作，该书中每个人物甚至事物都参与叙事，用直接对话的方式向至少两个以上的虚设读者发表议论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作者将叙事强度和速度掌握得精准到位，展现出极纯熟高明的叙事手法。通过这种叙事手法，帕慕克表达了当时土耳其社会的历史现状与文化背景，本为旨在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，并简单分析《红》的文化隐喻。

关键词：文化 冲突 多角度

帕慕克的重要代表作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以叙述者的多重视角为显著特色的，小说《红》全部以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叙述：全书共 59 个小标题(章)，都从不同身份的“我”展开讲述，如“我是一个死人”、“我的名字叫黑”，这个“我”实际上指涉了 19 种不同的人、物身份，发出了 20 种不同的声音。同时，小说的三条线索包含三个主题：爱情、谋杀和文化哲理，但与它们相关的角色出现的频率却呈倒金字塔结构，即爱情主人公出现的频率最高，其次是谋杀，文化的东西相对分散，而小说的落脚点恰在文化思考，这正是该小说叙述的核心技巧所在，以通俗题材和形式承载更为深广的思想内容。小说在叙事技巧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多个叙述者的多重角度，这种叙事策略与当代文化的多元性不无象征关系。本文旨在探讨红的叙事与文化主题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
我们可以看到《红》的每个角色都参与了叙事，主人公黑、黑的姨夫、姨夫的美丽女儿即黑的恋人谢库瑞、女奴、死人、画上的一只狗、一棵树、一枚金币，甚至没有形体的死亡、红色都作为叙事的主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对于小说的这种多重叙事，作者自己曾有过很好的解释，他说：“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，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。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部丰富的乐曲，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。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借助上。帕慕克采用这种新颖的叙事角度并不是凭空想象，也不是故弄玄虚，而是由当时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。《我的名字叫红》发生在 16 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，在时间上正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，这是一个文化信仰、社会结构、经济结构激烈冲突且重新定位的时期；在空间上，奥斯曼帝国地处欧洲边缘，与亚洲交接，是两大洲的联系纽带，也是两大洲的文化经济最先遭遇碰撞的地方。从故事发生的时间、地点来看，都充斥着纷繁众多的矛盾、冲突，当各种观念交杂在一起并都认为我方正确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都来说话，让各种声音都公平地到达读者面前，任由读者判断取舍。因此，从多人物叙事结构的叙事方法来看，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存在，才决定了有必要让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发声。

从《红》描写的三个故事：细密画派与法兰克画派、真主与撒旦、东方与西方也可以看出文化的杂糅与冲突。故事的核心事件围绕着一一次艺术家团体的内讧展开：土耳其特有的艺术“细密画”在历代艺术家的忘我献身和不断努力下已臻完美，并形成按安拉的意志创造的不讲透视法的艺术特色，但它正在受到来自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威尼斯肖像画的冲击：以奥斯曼大师为首的正统派致力维护传统；而以“姨父”带头的秘密团体却力倡西式画法，

并企图取代前者。“橄榄”、“高雅”、“蝴蝶”和“鹤鸟”这四位顶尖细密画师既是奥斯曼大师的爱徒，又暗地里受雇于姨父。其中“高雅”与有恐怖倾向的胡斯莱特教派过从甚密，“橄榄”为了消除秘密团体的隐患谋杀了“高雅”，又出于冲动和私杀害了姨父。奥斯曼大师在受命追查凶手之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，又将谋杀主犯嫁祸他人，以图一网打尽，坐收渔翁之利，结果是阴谋被挫败，凶手也意外身亡。透过两个凶杀案、一个爱情故事，帕慕克想要展示给读者的是16世纪末西方法兰克画法对伊斯坦布尔当地的细密画家的影响，以及在影响过程中细密画家漫长的矛盾、挣扎、接纳。书中讲：“我干下这桩事件，不只是为了拯救我们，更是为了拯救整个画坊”杀人是为了拯救；“我怀疑我之所以杀死他们，其实是为了创作这幅画”。杀人是为了创作。确实，在这场冲突中，没有谁是谁非，大家都是在为维护自己内心的“神”而战，谁都有坚持或改变自己信仰的权力。

《红》将对现代文化危机的反思寄寓在业已消亡的艺术形式之中，这与帕慕克独特的历史观有关，在他看来，被历史所遗忘的东西更能引人思考，他曾引用一位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的话说：“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国家，你必须忘掉许多事情；国家是这样一个联合：它不是由我们所记得的东西组成的，而是由我们所忘记的东西组成的。16世纪流行的土耳其细密画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淡忘，但小说中它成了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争夺焦点：细密画代表了精致但因循守旧的传统；肖像画代表了更合乎自然和个性的西方新兴文化。细密画被肖像画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，问题在于在这种必然面前各人所取的态度，于是，围绕着一张神秘而子虚乌有的苏丹肖像画，不同的叙述者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剧，这悲剧始于文化冲突，却植根于内在人性，不同层次的人物身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

《我的名字叫红》让各个人物事物都出场，言说各自不同的时空经历、表达各自“此在”的时空感受，展示各自的文化内蕴。基于作品广袤无际而又深不可测的求索疆域，小说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叙述的多元性、主体性绝妙契合并揭示了文化杂糅与冲突的主题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奥尔罕·帕慕克.沈志兴译.我的名字叫红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- [2] 格非.小说叙事研究[M].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
- [3] 勒内·韦勒克、奥斯汀·沃伦《文学理论》 刘象愚等译,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.2005年.